

本校博士生研讨邓小平南巡讲话综述

日前,校研究生部专门组织了一次博士生研讨会,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交流各自的学习体会,并就小平同志讲话中涉及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研讨会上涉及的若干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特征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深化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表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也保留了将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特征的传统观点。现在小平同志根据国内外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发展经济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和经济调节的手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不是计划,而是公有制基础上有先有后的共同富裕。这再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根据这一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不宜再以“有计划商品经济”来概括,而直接表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公有制商品经济”更为确切。有的同志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现代商品经济,需要以发达的市场为依托,它不能停留在物质产品的市场化,而必须建立在资金、劳务、技术、土地等诸要素均市场化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的同志从市场机制与传统的国有产权管理制度的矛盾出发,对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相容性提出疑虑,认为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更适用于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适用于私有制。对此,有的同志提出,计划与市场各有利弊,只要两种机制结合得当,功能互补,并相应改革国有产权管理制度,那么,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公有制是完全有可能同市场机制相容的。不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更自觉、更完善、复盖面更广的特点来看,这种相容性需要以计划作为桥梁,因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二、关于姓“资”姓“社”问题

大家认为,小平同志这方面的论述的确抓住了

加快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胆探索,应该允许试验,既不能把市场机制和国际惯例简单地判定为不姓“社”的异己力量,也不能匆忙地将一些具体的改革开放措施贴上姓“资”姓“社”的标签,更不能停留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而失去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经过讨论,大家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以下三点共识:首先,有许多东西(如计划与市场)是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是不同社会制度下所共有的,它们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某些东西(如经营管理方式和工资、利息、股息等经济范畴)也可以借鉴、改造,变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即在改变剥削性质的前提下借用其形式。再次,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一切管理都具有两重性,即不但有制度性、阶级性、价值取向性的一面,也有技术性、手段性、非价值取向性的一面,前者是社会属性,后者是自然属性。我们不能只注重其社会属性的区别,而忽视其自然属性的共性,人为地束缚自己在借鉴与改革中的手脚。根据上述认识,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更大胆地借鉴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外国的经验,破除过去那些因担心姓“资”而产生的“只可引进技术不可引进管理”、“只能引进管理方法不能引进经营手段”、“只能借鉴微观不能借鉴宏观”、“只能借鉴方法不能借鉴理论”、“只能借鉴理论不能借鉴政策”等种种片面认识与思想禁区,不但要大胆地引进与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会计、财务、营销与企业管理等微观经济管理经验及其理论,而且也要大胆地借鉴外国的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计划统计、市场运作、景气监测、法制监督等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及其理论。

三、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战略问题

有的同志回顾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经历的几次改革开放的高潮,说明加快改革开放不仅取决于主观努力,也同客观上的机遇有关。现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得快一点,也是充分考虑了机遇问题的。大家一致认为,九十年代的国际政治

风云与战略格局的变化、国际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老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既对我们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当前，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鼓舞下，精神振奋，人心思干。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九十年代将各条战线的改革向前推进一大步。

有的同志指出，当前加快改革开放既需要鼓劲，需要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也需要冷静地总结八十年代几次改革高潮难以持久的教训，合理地预期与制订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大家认为，我国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战略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对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改革，都要允许试验，放开胆子闯，尤其要注重在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创造经验，并及时形成规范的东西向全国推广。（2）要敢于抓重点，打好改革的“攻坚战”。与价格改革相比，企业（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难度更大，

必须毫不放松地一抓到底，并且不回避产权制度、就业制度和领导体制等敏感问题，才能真正完成企业机制的转换，从根本上解决大部分企业效率低下的痼疾。（3）围绕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合理竞争所需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进行价格、税制、财政、金融、计划、统计、物资、外贸、劳动人事等诸方面配套改革。（4）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同志指出，近年来，政府机构又出现扩张趋势，这不仅使改革成果之一的财政收入增量被行政事业费的迅速膨胀所抵销，而且许多政府机构（尤其是企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仍然以管企业的投资、生产、经营、定价、用人、分配等为主，对企业机制转换形成了重重阻力。此外，当前企业内部体制随着股份制等企业模式的出现也涌现出许多新问题，如企业党委与董事会及总经理的关系、公司董事会与职代会的关系，等等，也需要及早研究解决。

（储敏伟 整理）

（上接封三）场及早而稳定地形成和发展，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发 展证券投资学，以理论为先导，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作者的上述观点和书中的一整套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应当说确实是起到先导作用的。

本书论述的证券投资学原理，不但对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证券投资事业具有先导性，而且对于今后我国证券投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先导性，这是本书的又一成功之处。值得例举的诸如关于期权和期货的论述。期权作为一个专门的金融范畴，是专就有关普通股票买卖的权利而言的，而现在正在逐渐推广运用于其他方面，如货币期权等。为此，作者在书中作了系统的先导性阐述，向读者展示了前景。更应着重指出的是书中关于“证券组合”管理的论述，以及关于当代“证券组合”理论的研究等等，其先导性可谓尤为突出。作者周密地一一阐明了当代“证券组合”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当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内容；资本市

场线；资本资产价值模型；Beta分析法及其局限；当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发展等。这些理论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无疑是颇能打开眼界的新鲜的学说。因为，简言之，当代“证券组合”理论提出了一套证券分散的方法，可以使投资者把“组合”的风险减少到最小的限度，并使投资者选择一个含有最小风险的最为有效的“证券组合”。诚然，这是证券投资中人们关注和敏感的一个新课题。这里，本书的论述是超前的，也具有导向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以上三大特色，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示性，正如有的中青年读者所说：“此书在手，手不释卷”。

值得一提的是，据悉朱教授目前已经在本书基础上，对证券投资学的一些新课题（诸如“投资市场”、“投资公司”等等），正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作者在新的耕耘中，喜获更多的新的科研成果。